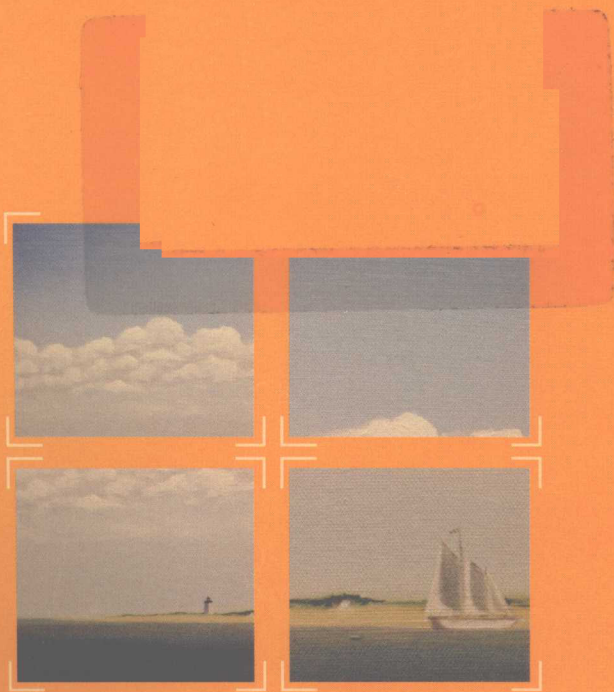


李欧梵作品



现代性的追求

从文学史的角度，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对西方事物的爱好表现出这样一种热情的努力，那就是把整个十九世纪压缩在十年的时间里。但这种现代性从未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胜利过。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现代性的追求

李欧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李欧梵作品)

ISBN 978-7-02-008033-5

I. 现… II. 李…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8235 号

特约策划:陶媛媛
责任编辑:杜丽
装帧设计:余笑乐

现代性的追求

李欧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8 千字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2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033-5

定价:34.00 元

总序

李欧梵

我的写作生活不算长，至少比学术生活短得多。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赴美留学，在环境影响下用英文写学术论文，不觉已有半个世纪，直到最近十年，才着力用中文写作。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所有的中文作品都是习作。

有人把我的中文作品称为“学者散文”，但没有解释，顾名思义，似乎指的是作为一个学者写下来的随意而松散的文章。然而散文其来自，可以上溯至明末的小品文。在西方称之为“essay”，法文叫作“essai”（有尝试之意），这两个传统不尽相同，我的文章都配不上，只能勉强称之为“杂文”，但又缺乏鲁迅式的匕首投枪的作风。我从不用尖酸毒辣的文字去批评世界或人物——这一点“鲁迅风”我完全没有学到，虽然自己确曾研究过鲁迅。也许，对我而言，“生活”这个人文文本太丰富了，它是我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如果把前人的生活和时代加上去，更像一座宝山。我每读一本前人的著作，不论中西，都觉得如在山下掘

宝,越挖越兴奋,越发感到高山仰止,灵光灿烂。个人最中意的小文都与这类读书报告有关,如《狐狸洞书话》。生活加读书,人生的意义足够了。

现在我的好友季进和黄育海、陈子善策划将这些中文作品和中译的学术著作,汇集成“作品系列”出版,作为送给我的七十岁生日礼物,我却之不恭,只好笑纳。这个作品系列不代表什么写作成绩,只是一种生活和读书的感受与潜思的记录。这么多年积少成多,竟然有将近二十卷之多,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

除了某种纪念意义外,“作品系列”的面世,自有其公共的意义:这些参差不齐的文章,都要再度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一个文本的“整体”,有点太“重”了,似乎当年的“狐狸”变成了一个大“刺猬”。然而,我曾屡次提过,自己的文章绝对成不了系统,因为我的兴趣太广,在人文领域几乎无所不包,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岂能成为刺猬式的思想大师?我愧不敢当,只能说,这个系列所代表的是一种积累,犹如重新发行的一套唱碟,希望价廉物美,消费者喜欢就好。

这个系列也代表了我日趋多元的兴趣。回顾起来,糟杂之中也自有脉络可寻,总而言之,可以用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电影和建筑这几项人文科目来概括。我学的是历史和文学,但兴趣遍及其他各项,加起来的看,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文主义者。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现代性”文化的各种吊诡层面。我的时间范畴是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我游移的文化空间也遍及东西方。不知何故,近年来反而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和文化兴趣日增。别人可以在文化上落叶归根,我却不自觉地飘零四海,其乐也融融,所以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甚至把双语写作和阅读作为一种常态。

这个系列中的各书出版次序可能不会以写作先后为序,因此我必

须略作交待。如果把学术著作和杂文写作放在一起,很明显地可以归纳出一个轮廓:我是先从“五四”时期的浪漫精神出发,逐渐向不同的文化时空探索和投射。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从“五四”走向一九三〇年代,而鲁迅研究则成为一个中介,他晚年住在上海,我也不觉对上海的都市文化产生兴趣,甚至为了摆脱鲁迅的“魔障”,故意去研究他最不喜欢的东西——十里洋场的摩登上海。我万万没有想到,当年的一股“反动”和好奇,竟然使得拙作《上海摩登》一度成为上海怀旧浪潮的标志之一,这更激发了我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

我作品中的另一条空间脉络是香港和台湾。我生在大陆,长在台湾,在美任教三十多年后,退休到了香港,目前则在港台两地游走。从地缘政治而言,我似乎地处边缘,我也故意采用一种“边缘视角”,别人——特别是自觉或不自觉的“中心主义”知识分子——可能嗤之以鼻,我却甘之如饴,甚至以此自我定位。对我而言,边缘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我不受“中心”情结的牵制,可以随意转变视角,扩展视野,由中而西,由美而欧,甚至指向西欧的边缘小国如捷克(当然这也拜昆德拉所赐),近日兴趣又转向南美和南亚(如印度)文学,下一步可能是解放后的南非。总而言之,我认为只有处在边缘才能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边缘视角也影响了我的思想内容。我的不少想法往往和“主流意识”不同,不见得是“对着干”,而是不自觉地另辟蹊径,走个人的道路。我不敢说自己的看法是“灼见”(insight),或创见,只能自嘲是“不按理出牌”的结果,对于学术理论尤其如此。这一方面,我在和季进、陈建华的两本对话录中都曾仔细地自我分析过,此处不赘。

我的另一面“不按理出牌”的表现是感情。一般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往往把自己藏在“客观”之中或隐于文本之外,我恰好相反,从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就感情外露,侵入研究的

对象,甚至自觉地另用散文形式去踏寻徐志摩的踪迹。这一股浪漫情绪,见诸我早年在台湾出版的两本散文集《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多年来这股“余绪”一直支持着我的内心生活,终于在十年前我和子玉结婚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但我们夫妇合写了三本书,而且我在人生进入老年之际,从子玉身上学到一个“真”字,因此也把一股真情用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之中,笔锋常带情感,文章到处可以看见主观的“我”,这也是一种风格和立场。当然,有时主观会导致偏见,我也在所不顾了。从“浪漫”到“偏见”——但并不偏激——这也许可以总结我的心路历程吧。

以上的这些自剖,其实都是多余的话,文章写完发表,有它独立的生命,应该听由其自生自灭,这是我一贯的主张。这个作品系列,除了献给支持我写作的妻子外(连这篇小序也是今早她给我的灵感),也愿意献给所有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朋友。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于九龙塘

序 言

这本论文集从头到尾都是王德威教授一手策划完成的，他发动了不少研究生作吃力不讨好的翻译工作，并亲自编排目次，在每辑加上小标题，并大力鼓动台湾麦田出版公司出版这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我本想请他为这本集子写序，但他却只答应写后记，所以我只好在为别人写序之余也为自己的旧作写几句。

虽然在文学理论上我不相信作者已死、文本至上，但在实践上——特别对于自己的作品——我却坚守一个文本独立、自生自灭，与作者无关的原则。这本集子既是德威所编，我只回答几个编辑上的小问题，脚注的补足及原文的校对则是托陈建华先生尽责的。陈先生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现在重新在美国做研究生，在哈佛攻读，他对这本集子下了不少工夫，在此一并致谢。部分文稿的中译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刘剑梅、廖世奇、陈绫绮、何素楠（Ann Huss）完成，也要谢谢他们的辛劳。

既然写序，我也许应该把这些文章的学术背景稍作一个交代。

这些论文是在不同的时期写成，最早的约在七十年代初，即第三辑“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中的两篇。记得当时美国大学尚无现代中国文学这门专业学问，虽然中国大陆的文学史教材一大堆，英文的宏观材料尚付阙如，所以这两篇滥竽充数，用的多是中文材料，但在诠释方面则是一脉相承夏氏兄弟——夏济安和夏志清教授——的家传，我忝为济安先生的受业弟子，而多年来也从志清先生处受益良多。半世纪以来，美国学界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科书只有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本，无论后来学者对其观点有何争议，它的奠基之功是绝不可没的，这本书已成了“古典”（classic）和“传统”。而我对传统的看法是一向反对五四和文革的观点，我主张继承而不赞成扬弃，更反对以挹伐前人之功而作自己学术进身之阶的行为。所以，这本论文集的内容虽与志清先生的关注点不尽相同，但没有《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启示，我也不会下决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

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西洋文学，在美国念研究院时专攻中国近代思想史，所以在方法上我永远徘徊于历史和文学之间。而个人兴趣更是既中亦西，乐此亦乐彼，但却缺乏比较文学上的严格训练。有心的读者，当可在这些文章中看到不少方法上的兼容并包、但却不甚稳定的优缺点。而对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方法，我往往故意唱反调，譬如不赞成把文学史腰斩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时期。而多年来我就一直试图“超越”在大陆学术界挂帅的现实主义和革命主潮。所以第二辑中对浪漫和颓废方面的偏重，以及对文学上“现代主义”及文化史上的“现代性”（modernity）的探讨，都是个人的反潮流的学术尝试。至于有关电影和文化批评的论文，则反映了近几年来兴趣。我一向是个影迷，而对香港电影之“迷恋”，更早于香港电影在美国吃香之

前，因为我认为它代表了一种文化的多元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商品。有鉴于西方的“后现代”理论风起云涌，但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却不着边际，目前反而变成时髦口号，所以我也稍作一点“反潮流”的工作，试从海峡两岸各个地区的文化实践的研究上探讨当代世界文化的意义，并以此与美国学院中的“多元文化”理论作商榷。由此看来，面对中国和美国大陆学界，我都故意站在边缘的地位。

走笔至此，似乎已经犯了作者意旨介绍过多的大忌，必须就此打住。关心现代文学的读者和同行或可在这些内容零乱的“文本”中得到些许启发，也可把它当作研究上的初步材料，有待教正。如果这些“明日黄花”能够真正引起“明日”——年轻一代——台湾或大陆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则是我最大的愿望和荣幸。

李欧梵

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剑桥

目 录

总 序	1
序 言	1

【辑一 · 真的恶声】

“批评空间”的开创	
——从《申报》“自由谈”谈起	3
来自铁屋子的声音	22

【辑二 · 浪漫的与颓废的】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个人主义	43
孤独的旅行者	
——中国现代文学中自我的形象	67
情感的历程	87
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	
——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	107

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 121

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 137

【辑三 ·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之路】—————

追求现代性（1895—1927） 173

走上革命之路（1927—1949） 242

编后记 王德威 332

| 辑一 · 真的恶声 |

“批评空间”的开创 ——从《申报》“自由谈”谈起

一 “公民社会”还是“公共空间”？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或译“市民社会”)的讨论颇为激烈,中国是否出现“公民社会”遂成为争论的问题。然而,哈贝马斯对于“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的论述,似乎较少引人注目,甚或与“公民社会”混为一谈。我个人认为前者是哈贝马斯基于欧洲十八世纪以降(特别是英、法、德三国)的政治史衍演而生的一种理想模式,虽基于史实,仍是一种有关现代性的理论陈述,将之硬套到中国社会,实在不必要,内中牵涉问题太多。甚至“公民”及“社会”这两个名词,中国本来就没有,晚清时译介到中国,大多是经由日本而来,而中西文化背景不同,甚至对于“公”的概念也歧异甚巨。总之,我是反对近年来美国汉学界确定中国有公民社会的看法。

然而,对于“公共空间”的问题,虽然在哈氏理论中与“公民社

会”密切相关，但不必——也不应该——混为一谈。我认为它指涉的是构成公民社会的种种制度上的先决条件，而这些制度的演变可以作个别的探讨。所以我一向把“空间”一词视为多数，在英文词汇中是space，而不是sphere。而中国学者似乎对“空间”一词较易认同和共鸣，而对sphere（领域）一词反而不易了解。

我对哈贝马斯学说的故意“误读”，目的是在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问题：自晚清（也可能更早）以降，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所谓“公共”，这里指的不一定是“公民”的领域，而是梁启超的言论——特别是所谓“群”和“新民”的观念——落实到报纸而产生的影响。换言之，我认为晚清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其基本的差异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而“社会”一词恐怕也是恰在此时开始经由日本而传入中国）。这种新的“公共”的声音，是如何形成的？用什么形式表现的？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而它表现的园地，也因之而成为一种新的“空间”。再浅显地说，我觉得报纸的“副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它不但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传统，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媒体”的理论：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和印刷媒体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报章杂志特别重要，然而西方报纸并没有一种每日刊行的副刊。至于它和民主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此处不能细说。且先从晚清一个众所周知的报纸副刊说起。

二 “自由谈”的游戏文章

上海的《申报》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大报，创立于梁启超办报之

前。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它显然也受了梁启超和其他晚清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内容上出现了反映社会风气和批评时政的文章，刊于“自由谈”版（显然也是受了梁氏《自由书》的启发）。这类文章的栏目和格式很多，诸如：“新乐府”、“新丑史”、“新笑史”、“海外奇谈”、“忽发奇想”、“轩渠杂录”、“新回文诗”等等，当然还有长篇小说（大多是改译）的连载。而这些栏目出现最多的是“游戏文章”。我觉得“游戏文章”是“自由谈”的主要特色，内中不少文章饶有风趣，也最能代表晚清到民初的文化批评。所以在此仅略选几篇分析，以求引起学者同行的兴趣。

“游戏文章”这个专栏的始作俑者是谁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游戏”二字，可能受到李伯元主编的《游戏报》的影响（此栏第一次出现的时间约在1911年左右），其宗旨可以在一篇自我指涉的《游戏文章论》中（载于民国六年，即1917年10月6日《申报》第四版“自由谈”）看到全貌（此文所引文章的标点皆由我附加）：

自来滑稽讽世之文，其感人深于正论，正论一而已，滑稽之文，固多端也。盖其吐词也，隽而谐；其寓意也，隐而讽，能以谕言中人之弊，妙语解人之颐，使世人皆闻而戒之。主文谲谏，往往托以事物而发挥之，虽有忠言谏论载于报章，而作者以为遇事直陈不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之文为有效也。故民风吏治日益坏，则游戏文章日益多，而报纸之价值日益高，则阅者之心日益切，而流行者日益广。官吏恣其笑骂，讥刺寓乎箴规，则世之所谓俳谐者乃所以警世也。文士读而善之，欲假文字之力挽颓靡之世局，上之则暗刺夫朝廷，下之则使社会以为鉴。虽有酷吏力无所施，言者既属无罪，禁之势有不能，则